

排名与高等教育的公益作用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高等教育学教授兼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室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 主任, BH Associates 的教育顾问及合伙人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现今最具公共和政治关切的问题之一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从历史上看,大学与其所在城市和国家有着密切关系。然而,现在它们通常被认为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毕业结果还不如追求全球声誉重要。

最近,世界范围内的大选和政治动荡表明,社会物品的不平等分配激起了严重不满。近期在美国发生了大学入学交易的丑闻,人们通过交易使精英大学可以为学生开后门入学,这突显了社会分层的加剧,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有关大学作用和职责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大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和监督的背景。这使大学承受压力,它们需要向其社区和地区做出更多贡献、与商业和公民社会合作并证明其能力与成绩。

排名将自己描绘为增加更多的公共信息和披露更多社会事实的工具,在国际层面比较大学的表现以为学生/家长、政府和更广泛的公众提供信息。但是,排名通常是衡量几十年来(即使不是几个世纪)从公共和/或私人财富和投资中获得的收益。排名选择指标的目的在于吸引那些准时毕业并继续成功事业的高成就/拥有较好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卓越是根据个别大学的成就而不是集体对社会的公益贡献来衡量的。这些因素再次出现于排名使用和宣传的指标中。

排名和社会影响

为了回应批评并扩大其吸引力及其“产

品”范围,排名已开始衡量大学的社会承诺。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和QS排名历来从科研合作或第三方/企业收入来衡量大学的社会参与度。这被解释为知识转移的替代选项且完全依赖于院校数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则使用传统的科研指标,并未偏离这种方法。相比之下,“多维全球大学排名”(U-Multirank)一直使用更广泛的指标。区域参与度的衡量标准是学生实习、毕业生就业以及与区域组织的参与合作,而知识转移的衡量标准则是与企业合作、专利/衍生产品以及与企业的合作出版。它也使用院校数据,并在数字和百分比之间切换。“国际绿能世界大学排名”(Green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始于2010年。它由印度尼西亚大学开展,该排名比较了“大学对绿色发展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它面临院校数据不足的困扰,但在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日益提高的时代,它已开始获得一定的吸引力。不足为奇的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S排名也正开始涵盖社会影响。

QS将社会责任纳入其QS星级排名(QS Stars Ranking)之中。它通过大学支持当地社区和提升环境意识来评估大学履行社会义务的程度。指标包括社区投资与发展、慈善工作和救灾、区域人力资本以及环境影响。前两个指标以占运营资金1%或200万美元的财政捐款来衡量承诺;后两项则包括该地区的

学生招募和毕业生就业以及可持续发展行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其大学影响力排名 (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 获得了极大好评。该排名衡量了与 17 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中的 11 个保持一致的活动。大学必须提供有关第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 即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合作、推广最佳实践、数据的发布, 且至少提供其他三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这使大学能够脱颖而出并发挥自己的优势。每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都包含若干指标, 但科研活动占每个指标的 27%。这使新兴的或非研究型大学很难产生影响。除 Elsevier 的科研数据外, 大学提供所有证据和实例。但让人伤感的事, 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 且院校的数据或评论也不一定可靠。大约 556 所院校提交了有关一个或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 而 141 所院校 (占 25%) 提交了有关排名中 11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

替代方案

还有其他不太为人所知的排名, 加上政府不断增加的努力, 它们正寻求并显示有关大学公益贡献的比较信息。最著名的是《华盛顿月刊》(the Washington Month) 的“大学指南和排名”(College Guide and Rankings), 该排名改写了肯尼迪的话: “虽然其他指南在询问大学可以为学生做什么, 但我们询问的是大学可以为国家做什么。”它认为大学应被视为社会流动的引擎, 支持学术知识和科学研究, 以促进知识发展和推动经济增长, 并灌输/鼓励服务的意识和道德规范。它还开发了社区学院的排名。较早的例子是“我们的城市救世主: 最佳学院和大学公民伙伴关系调查”(Saviors of Our Cities: Survey of Best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ivic Partnerships), 该调查衡量的是“高等教育机构对其所在城市

的正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在这一调查之后出现了“都市大学排名”(Metroversity Ranking)。另外, “回报率最高的美国大学”(America's Best College Buys) 最初是由《财富》杂志在 1990 年发布的; 现在被《福布斯》(Forbes) 更名发表——“美国最有价值的大学”(America's Best Value Colleges)。它分析了“根据不同因素应如何预期一所大学的成本。”类似地, 《华盛顿月刊》也创立了“最佳收益大学排名”(the Bang-for-the-Buck College Rankings)。

政府正在询问类似的问题。对学生表现、支付能力和毕业生成功的担忧以及公众/社区的参与促使世界范围内采取了大量行动。这些工具与排名无关, 而与问责制有关。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 美国政府通过一项名为“大学计分卡”(College Scorecard) 的工具将入学机会、可负担性和结果联系在一起。现在, 这一范围正在扩大, 以更加注重个人项目而非院校。英国开发了“教学卓越框架”(the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和“知识交流框架”(the Knowledge Exchange Framework)。欧盟发起了几项旨在吸引公民社会参与和寻求对公民社会的影响的倡议。最近几周,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成立了高等教育价值委员会(the Post-Secondary Value Commission), 以评估大学为学生创造价值和为学生创造经济机会的能力。

行为驱动——朝哪个方向行进呢?

引发关于大学公益问题的工具受到欢迎。但是, 大多数努力是关于经济影响的, 即高等教育如何达到有效、公平和效率的目标, 而非探讨更广泛的社会影响。部分原因是因为通过新思想等来衡量文化和社会影响或对公众话语的价值相当复杂。但是, 通过对文化机构、民主、国际理解以及整个社会

的价值体系和政策的贡献来体现的软实力同样强大，并且可以通过移动投资和人才显著影响一国的国际地位。

毫无疑问，排名会驱动行为，但行进的方向取决于指标的选择。政府和大学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常常大胆地改变政策和优先事宜以提高排名，以免落后于领国或竞争对手。但是，鉴于排名机构的真正意图是出

售杂志、报纸和/或咨询服务，它们是否也要承担责任呢？实际上，尽管排名机构呼吁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但其排名方法却很少公布。仅谈论大学的共同社会责任已远远不够。我们是否应该谈论排名组织本身的共同社会责任呢？